



濟問題的看法，確定了經濟行為的規範。對於天主教徒來說，這些論著雖非關於教義的唯一的、毫無差錯的闡述；但是，由於在複雜的社會經濟生活中論戰性地表明了天主教的立場，以教皇社會通諭為主體的天主教社會理論對天主教徒不僅具有一定的理論約束性，而且通過他們自己的信念和理解，從教會的這些論述中獲得關於經濟行為的可靠準則，成為自己的經濟倫理學，以實現在經濟生活中的正確選擇，而在這些論著中，值得重視的有德國天主教社會理論家席林(Otto Schilling)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

二 席林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

席林(1874-1956)作為德國天主教神學家，自一九一六年起任圖賓根大學教授，長期致力於研究早期基督教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v. Aquin)和教皇利奧十三世的社會理論，撰寫《天主教社會倫理學》、《道德神學教本》(兩卷)、《社會問題》、《現代經濟問題》、《聖托馬斯的國家和社會理論》、《社會哲學與法哲學》等，發表於一九三三年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是他的一部影響較大的著作。

就《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社會時代背景而言，雖然此書出版時，正是希特勒開始取得德國政權，建立其民族社會主義的極權主義統治的初期，但就它的內容而言，實際上涉及的是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魏瑪共和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現實。至於此書的理論背景，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關於此書的指導思想，正如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所說的那樣，是依據教皇皮烏斯十一世的社會通諭《四十年》的原則寫成的，或者說是「遵循和發展了」其原則。第二是關於此書的論戰特點。一九二七年，馮施(Georg Wünsch)發表了《新教經濟倫理學》。

(*Evangelische Wirtschaftsethik*)，作為天主教社會理論家的席林，當然有必要對此作出反應。

《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寫作方式，或者說其內容結構，則具有明顯的教科書特徵。〈導論〉論證了經濟倫理學的概念、任務、可能性、原則和源泉等問題。〈基礎部分〉論證了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信仰基礎、基本概念和要求及非經濟的基本前提問題。這兩個部分是此書的理論部分，對於讀者了解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國民經濟總論〉從經濟活動的基本環節：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個別經濟部門〉則從經濟活動的基本部門：農業、工業、商業、財政出發論證了天主教經濟倫理學基本原則的應用問題。雖然這裏涉及的國民經濟具體狀況，在德國早已成為歷史，作者對此提出的一些具體看法，也不一定適用於現在的經濟現實，但其中所體現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則仍然有效。〈經濟的主要方向〉和〈教會在經濟領域內的權限和任務〉則有某種「總結」和「宣言」的性質。作者在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論述了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問題之後，表達了堅持「社會有機體制」的信念，確定了教會在經濟領域內的權限和任務。針對《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上述特點，以下從「德國天主教的經濟倫理觀」這一角度着手，概括此書的一些基本論點，並對此作出簡要的評價。

關於經濟倫理學的概念和任務，席林認為，為了給人類的生存提供和保障物質資料，人類必須從事經濟活動，但是，經濟活動不是目的本身；毋寧說，「最終的目的是上帝」，³因此，「經濟倫理學是對這樣的規範進

3. Otto Schilling, *Katholische Wirtschaftsethik*《天主教經濟倫理學》，München, 1933，頁5（即中譯本頁8，以下引用者，均為中譯本頁碼。——編注）。

行學術的論述和發揮，它們使經濟的所作所為符合滿足需求的相應最近目的，並進一步符合最高目的。」⁴那麼，經濟倫理學是否能夠發揮這一功能呢？對此，席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強調：由於經濟領域並不存在來自自私自利的不可抗拒、不容變更的規律，從而經濟倫理學是可能的；由於經濟領域只具有相對的自律，從而經濟倫理學是合理的。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基督教全部倫理學的最終目的和原則是，使人類和上帝——內心永遠幸福的對象——相像，因此就是包含上帝之愛和仁愛的仁慈」。⁵

從現代經濟主要方向的角度來看，天主教經濟倫理學持對經濟生活的有機性理解，主張經濟的社會有機體制。「對經濟生活起最終決定性作用的原則，是仁愛，這樣就產生了關於經濟生活的基督教的有機觀點。」⁶即「通過愛的原則和被愛當作最低標準的公正」⁷而形成的經濟共同體，是現代唯一能確保秩序與和平的經濟方向。這種社會有機體制的特點是：「社會組織體現了一個內在的、由上帝預先確定的目的。這個目的作為統一的紐帶，將從屬力量和從屬部分或者其成員有效地團結在一起，使它們為整體和為實現整體的目的而服務。」⁸「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方式本身可以和社會有機體協調一致……如果在經濟領域工作的人心中充滿了那種體制的基本原則，那麼，這種體制的精神將把經濟生活引入正確的軌道。」⁹

席林認為，和基督教的有機觀點相對立的觀點，主

4. 同上，頁8。

5. 同上，頁15。

6. 同上，頁16。

7. 同上，頁16。

8. 同上，頁310。

9. 同上，頁315。

要是自由主義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社會有機體制相對立的主要經濟方向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的原則性錯誤在於：它把國家和社會分割開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錯誤在於：它把兩者合而為一。當然它們的結果是一樣的：壓制個體和個性，因為個人和國家的對立是不可調和的。」¹⁰這裏，席林明確反對自由主義的放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主張經濟的社會有機體制：「如果首先要刻劃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特點，那麼，一開始就必須強調：這並不是對資本經濟的經濟方式本身進行評判，而是說明與經濟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繫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的特徵。」¹¹對此，席林認為有必要在基督教仁愛原則的指導下，對自由競爭及其供求原則作恰當的限制，恢復健康的經濟生活秩序，消除有害的階級鬥爭，關於社會主義，席林認為「社會主義是那種方向，它在限制個體經濟和強調共同體經濟方面走得太遠。」¹²從而，他對社會主義的「批評絕對不是針對這樣一種觀點，這種觀點僅僅反對資本過度的權力欲，它要求採取有效的國家措施抵制這種財產濫用，它自身不想要階級鬥爭，這裏的批評只支持和同意階級之間的爭論……這種爭論，能夠和應該導致社會的和平以及階層之間的和睦合作。」¹³

正是基於社會有機體制的原則，席林最後論證了天主教會在經濟領域內的權限和任務：在社會倫理和經濟倫理領域內，教會「被委託和授權對一切和道德準則有關的事物進行裁決。」¹⁴「教會也被授權，對經濟生活和

10. 同上，頁18。

11. 同上，頁298。

12. 同上，頁302。

13. 同上，頁309。

14. 同上，頁325。

經濟秩序進行裁決……一旦涉及美德的問題，那麼，最終的裁決屬於教會。」¹⁵從而，面對當時空前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席林強調：「教會必須拯救人類，因此必須向人類宣告在所有重要的生命攸關的問題上的真理，並對『什麼是應該的』作權威性的說明。」¹⁶此外，「教會不可以只滿足於教導，她同時必須——只要在她的權力範圍內——使由她宣佈的理論和思想變為現實，並對此進行引導和作出貢獻。」¹⁷至於完成教會在經濟領域內任務的基本途徑，就是倡導社會基督教運動。

三 德國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新發展

從德國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發展角度來看，發表於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已是一種歷史文獻了，它所面對的問題已為當代德國經濟生活的現實所超越了。但是，就《天主教經濟倫理學》一書所堅持的基本原則而言，或者就其所體現的天主教的經濟倫理觀而言，並未過時，關於這一點，可以現代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奠基者和長期執行者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論述為證。

在總結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成功經驗時，艾哈德說：「聯邦德國並沒有採用過甚麼秘密科學。我在事實上不過實踐了發展西方各國的現代經濟學原理，把漫無限制的自由與殘酷無情的政府管制兩者之間長期存在着的矛盾予以解決，從而在絕對自由與極權之間尋找一條健全的中間道路。」¹⁸這條健全的中間道路，是否就直接是席林倡導的社會有機體制的經濟發展方向呢？

15. 同上，頁326。

16. 同上，頁328。

17. 同上，頁329。

18. L. Erhard, *Prosperity through competition*《來自競爭的繁榮》，北京，1994，頁8。

這是可以探討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否認的是：席林的經濟倫理觀在現代德國的經濟制度中是有所體現的。這裏即使不考慮艾哈德本人的信仰背景，¹⁹也應該承認這一點。

實際上，正如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上的含義一樣，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也有其特殊的經濟倫理觀。德國社會市場經濟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的道德基礎上。這裏，個性的自由發展是第一層次的自由，經濟自由是第二層次的自由。與經濟自由相對應，有社會國家性原則和私有財產的明確的社會義務原則，包括國家的社會義務和個人的社會義務兩個方面。簡要地說，可以把德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倫理觀或道德框架概括為：基本上的個人自由，明確的社會義務。

當然，德國選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使個人自由和社會義務相結合的經濟倫理觀成為現實，絕非輕而易舉。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汲取了本國和其他國家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才選擇了比較符合國情和民意的經濟制度，從而造成了今日德國經濟的發達和人民生活的富裕。這裏，大多數公民對「個人自由和社會義務」相結合的經濟倫理觀的認同，也是其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之一。而在這一先決條件中，同樣包括着早就由席林的《天主教經濟倫理學》一書所發揮的天主教經濟倫理觀的作用。由此可見，在現代德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德國天主教的經濟倫理觀是必要的和積極的前提之一。

當然，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面臨的問題，不僅遠不

19. 艾哈德的父親是天主教徒，母親和所有孩子是新教徒。參閱 V. Laitenberger , *Ludwig Erhard – Der Nationalökonom als Politiker* 《路德維希·艾哈德——國民經濟學家作為政治家》，Göttingen，1986，頁10-11。

同於席林時代的問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也遠不同於艾哈德時代的問題(戰後德國經濟的重建和復興)，而是近幾十年來，在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的基礎上，德國建成「福利國家」的「富裕社會」的過程中產生的社會、生態和心理問題。正是面對新的時代問題的挑戰，德國天主教會及其理論家在持續關注經濟倫理問題的基礎上，自八十年代以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為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的興起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

例如，德國天主教羅滕堡－斯圖加特(Rottenburg-Stuttgart)主教管區科學院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組織了多次「經濟和倫理」的討論會，並在此基礎上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經濟倫理學大辭典》，²⁰基本上反映了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發展第一階段的成就。此外，在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的幾個主要代表人物中，天主教的理論家佔據了主導的地位。例如，艾希施泰特(Eichstätt)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倫理學和企業倫理學教授霍曼(Karl Homann)的「經濟秩序倫理學」，探討「一切人休戚與共」的道德原則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實現的社會條件問題。天主教的漢諾威(Hannover)哲學研究所所長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的倫理的經濟學，探討如何揚棄現代經濟和道德的分化，實現後現代經濟文化中經濟和道德的相互滲透問題。這兩個學派以其深刻、系統的理論性，分別成為當代德國經濟倫理學中三個影響最大的學派中的兩個，成為這一學科在德國最新發展的標誌。

此外，還有許多天主教理論家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踐上探討了當代敏感的經濟倫理問題，鮮明、具體、時代性地體現了天主教的經濟倫理觀。例如，美因

20. G. Enderle 等編，《經濟倫理學大辭典》，同前。

河畔的法蘭克福的聖喬治哲學－神學大學的耐爾－布羅寧²¹，經濟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所長亨格斯巴赫(Friedhelm Hengsbach)提出了當代德國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理念，即經濟活動的具體內容定向，體現了德國天主教經濟倫理觀的新發展。

亨格斯巴赫認為，由於人是經濟活動的中心，因此，經濟活動的具體內容定向涉及人的三種世界關係：事實的客觀世界、內在情感的主觀世界和規則化關係的社會世界。這三種關係構成了人類面臨挑戰的三個領域：自然、技術和社會，從而有必要確定三個基本理念：生命－人格尊嚴－參與。「敬畏生命」，無條件地尊重生命，不僅要求無等級區別地對待人、動物和植物，而且要求保護水、土地和空氣等自然產物。從而，自然環境的保護、社會環境的保護、對生命圈的重視同經濟增長一樣重要。技術不僅應為提高消費快樂，而且應為降低勞動痛苦服務，使人成為完整的人。人作為人格是一個小宇宙，是人的自我支配、自我意識、自身責任的中心，是人格尊嚴的基礎，從而，經濟倫理突出人的生活質量要求：人身安康，心理健康、社區聯繫、愛幼樂群的居住、適合生理節奏的技術和勞動時間等。參與的理念則進一步強化了人格尊嚴。當前，對經濟財富的極不平等的分配，儘管形式上的自由保障實際上對經濟決定權的極不平等的參與，是對參與理念的重大挑戰。因此，經濟倫理從社會邊緣集團的視角觀察經濟生活，堅持弱者基本需要的優先地位，以對經濟決定過程的參與度為基準判斷經濟改革。如果說，生命、人格尊嚴和參與的理念是規範經濟的普遍定向的話，那麼為了具體應用，始終需要新的闡述。特別是關於世界範圍內的公正

21. O.v. Nell-Breuning(1890-1991)為現代德國天主教經濟倫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